



出版文化丛书 · 文集系列

品尝记忆

我编辑生涯中人和书的故事

王维玲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出版文化丛书 · 文集系列

品尝记忆

我编辑生涯中人和书的故事

王维玲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品尝记忆：我编辑生涯中人和书的故事 / 王维玲著 .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068-4369-0

I. ①品…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0237 号

品尝记忆：我编辑生涯中人和书的故事

王维玲 著

责任编辑 庞 元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黄俊杰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 sina.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2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4369-0

定 价 58.00 元

把出版放在文化的坐标上考察

——“出版文化丛书”总序

出版与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文化是出版的内容，出版是文化的载体。一方面，出版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作为记载、传播、交流、延续文化成果的主要载体，出版承担着人类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重任，具有鲜明的文化特点。然而，出版在传承文化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各种非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前，伴随着出版物市场繁荣所出现的出版物内容的浮浅、低俗，文化垃圾充斥，出版物流通的虚假推介，严肃学术作品的戏说，文化领域的过度炒作等现象，都是缺乏文化品味的表现，是与文化出版的价值体系相悖的。在这种情况下，倡导“出版文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国家和民族的角度来看，出版文化肩负着构建民族精神谱系的重任。一个民族立足于世界，必须具有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才能具有独立的意识。而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的基础，是对于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延续中华文化几千年不断的重要一环，出版文化深刻地涉及中华民族文明运行的方向、方式和气象，赋予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姿态和风采，它左右着人心，凝聚着情感，孕育着精神，教化着后代，把它视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是非常必要的。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出版业是文化的基础产业和主要传播行业，

在文化建设中担当着重要的责任。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知识的传播和更新，出版从产生之日起便是文化的基本载体，担负着传播新知的历史重任。作为一个高度重视文化传承和文化传播的国家，我国出版业的文化积累和传播历来富有重要的文化使命和价值追求。一部中国出版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文化史，从文字使用、甲骨钟鼎到活字印刷、网络出版，不断记录、反映了思想文化和科技创新成果的文明历史。历史上重要的思想创新、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其传承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出版物传播得以实现。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知识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也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文化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文化创新的沃土。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出版文化肩负着引领出版业方向的重任。一个行业在它全面振兴的时候，需要对自己的文化理念有一个系统的而不是片面的、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认识，以建立自己繁荣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作为文化的基础产业，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尤其需要充分地清理出其千头万绪中的历史根源、文化脉络、智慧精髓和精神实质，才能辨析精微地把握“出版系统”的发生学、本体论、结构学和发展动力学。这就是出版文化“认识本我”的工程。因此，全面系统地梳理出版文化与出版理念的源与流，作为出版行业当下的必修课题，是非常适时的。

文化追求是出版业恒久的推动力。倡导“出版文化”研究，目的在于审视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提升出版业的文化品位。党的十七大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出发，作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大战略部署，发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大力发展战略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等部署。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客观上要求文化有一个超常规跨越式的大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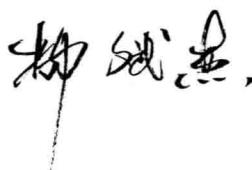
展。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出版文化历来是文化建设的基础部分。在当今时代，出版文化作为核心文化，不但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也记录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进步的运动轨迹。只有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承担起传承文化、繁荣文化的历史责任，生产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文化精品，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人们对于和谐文化的新期待。这是当代出版业的文化价值标准。为了保证出版文化价值的实现，当前的迫切需要，是构建新的出版文化的评价体系。这对于当代的出版工作者，也许是一种挑战。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挑战，是因为出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生产，内容创意、思想观念、民族原创力、文化价值、社会效益，均需在出版运营中得到充分保证。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与发展中统筹兼顾，继承出版文化的优良传统，改革出版业的生产流通方式，把文化积累与服务大众结合起来。出版业的改革与发展，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根本途径，而积极引导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大力推进出版“走出去”、增强文化软实力等一系列新课题，尤其需要一大批既有较高政治觉悟、文化品质，又潜心研究市场规律、熟谙经营之道的复合型人才去研究解决。出版产业化需要建立一套新的管理机制与运行机制，提供一个适时适度的制度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文化不只是编辑、策划层面的文本积累、传播的文化，更是一套制度文化、管理文化、企业文化。因此，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出版文化丛书”尝试跳出具体的出版实务，从社会政治、历史、思想、经济各个层面来思考出版的内在价值，从“出版文化”层面来探寻出版的发展规律；我认为其立意是高远的，对于出版文化建设以及出版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欣然应允为之作序。

我曾经说过，出版是个“有论无学”和“有学无论”的学科，需要人们去创立。从出版历史、出版实践、出版机构、出版家个人等方面来思考出版文化，是该丛书的基本定位。鉴于国内出版文化研究的相对分散，该丛书陆续推出 5 个系列，即出版文化学术系列、出版文化人物系列、出版

文化文集系列、出版物文化系列、出版企业文化系列等，计有图书 30 余种，拟用 5 年时间陆续推出。其中，既有总论性、概貌性、结构性的学术系列专著，也有出版界人物和机构主题的系列专著；既有宏观的、历史的全面考察，也有个案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各系列均着眼于反映出版文化最新研究成果，致力于建构出版文化学学科体系，其学术价值是值得期待的。

《周易》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又言：“其德刚健而文明。”文明而要刚健，必须有原创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化的总纲目和总体精神经过充分深入的原创性研究之后，浮现出来的原理、原则、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只有通过教育体制、传播体制，才能化为全民族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文化价值取向，成为举世同享的精神成果。对此，出版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是非常重大的。我希望借“出版文化丛书”这样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命题，把古今出版业蓬勃向上的态势放在文化的坐标上考察，反思出版职业的价值，提升文化创新的能力，以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出版业的新辉煌。



2008 年 8 月 22 日

(作者系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原局长)

目 录

第一辑

- 记忆中的胡耀邦 / 3
董必武·钱瑛·《俘虏的生还》 / 11
董必武·田海燕·《十老诗选》 / 20
林默涵——作家的知心诤友 / 29
向姚雪垠致敬 / 38
姚雪垠和《崇祯皇帝》 / 48
肖泽宽——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 62
沙汀与《红岩》及其他 / 73
满腔正气,一生清廉的朱语今 / 84
胸中荡大气的边春光 / 101

第二辑

- 吴强其人和《红日》其书 / 125
曲波全身心投入和呵护的《山呼海啸》终于问世 / 136
我所知道的王汶石 / 146
罗广斌和江姐——纪念罗广斌逝世 46 周年 / 160
《朝阳花》——马忆湘的心血之作 / 170
从《草原烽火》出版到《燎原烈火》面世 / 184

- 张扬和《第二次握手》平反的前前后后 / 219
晚霞之后是朝霞 / 249
早逝的好人李克异 / 274
追忆老编辑郭卓大姐 / 280
漫话航鹰 / 288
健笔常新徐光荣 / 299
我广东作协的文友们 / 309
从北川崛起的川妹子——母碧芳 / 360
“青春美文”女作家——乔叶 / 371

第三辑

- 从《小说季刊》走到《青年文学》那十年 / 379
漫忆《中华儿女》初创岁月 / 405
后记 / 421

第一辑



记忆中的胡耀邦

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喜欢回忆往事，我也是。近来在写追忆往事的文章时，胡耀邦的形象不时闪现在眼前……

我是一九五〇年三月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干四十多年，这期间我有幸与耀邦有过几次工作上的接触。“文化大革命”期间和粉碎“四人帮”以后，还因为工作关系，向他反映过一些作家的情况和要求，求助于他解决问题。这些久远的往事，有些已经在记忆里很淡很淡了。但有几件事，有如刀刻斧凿一般，深深地雕镌在我的记忆之中。

耀邦说：要考虑最大多数青年读者的需要；要出版他们迫切需要的书，他们喜欢看的书

一九六二年的中秋节，全国青联在北海公园举行联谊活动。当时《红岩》的作者之一、三十八岁的罗广斌正在北京，应邀参加了联欢会。我作为中青社的代表陪同他前往，在白塔下无比壮美的漪澜堂内，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紧紧地握着罗广斌的手，动情地说：“你们写了一部《红岩》，我不说你们写了一部好书，因为用好书这两个字已经不能概括它的意义了。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时候，你们出版的《红岩》，以出色的描写，感人的事迹，吸引了广大青年读者，以革命烈士的高尚品格和牺牲精神，成功地进行了一场革命理想和革命气节教育。使人们从关心自身的热量，到树立起乐观的信心，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境界去战胜困难。《红岩》对社会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过了一部好小说的作用。”这是耀邦五十年前的一次

谈话。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情真意切，回味无穷。

一九六一年《红岩》出版后，立即在读者中掀起阅读的热潮，在很短的时间里，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在一次团中央书记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的会议上，耀邦又以《红岩》为例，要出版社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重点书上。他说：“你们要把力量放在抓重点书上，不要方方面面都照顾，要树立搞‘大盘菜’的思想，当然‘拼盘’也可以搞一点，但对你们中国青年出版社来说，对象是青少年读者，树立搞‘大盘菜’的指导思想尤为重要。出版一种有影响的重点书，比出版十种一般化的书要好得多。要考虑大多数青年读者的需要，要出版他们迫切需要的书，他们喜欢看的书。”五十年前耀邦讲话的精神，与今天我们提倡的抓精品、出佳作的指导思想多么相似啊！

当时耀邦还提出一批选题，要出版社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我记得，在学习贯彻耀邦讲话精神和总结《红岩》出版经验时，我们提出了几条抓重点书的措施，列出了一批重点书稿的线索，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耀邦提出的抓重点书，搞“大盘菜”的指导思想，一定能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出版工作上开花结果的。

耀邦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酷爱读书，他从头至尾读完了二十四史这部历史巨著

耀邦好学，酷爱读书，在团中央是出名的。他在团中央工作期间，有时点名要看某某书；有时让我们给他找书看；有时他送来一两篇古文的注释，让我们请专家校订；有时他还推荐一些他看过的书让我们看……我在出版社工作期间，还没有发现有人从头到尾读完了二十四史的，而耀邦是把我社资料室珍藏的二十四史古本全部读完了。我常想，为什么同样的题目，同样内容的讲话，出自耀邦的口，就让人感到博古通今，思想深刻，语言丰富，幽默风趣呢？这与他酷爱读书，又善于思考分不开。知识来源于学习，豪情胆识来自认识，认识又来自知识的积累和不断的实践。耀邦思想开阔深邃，与他好学多思有密切关系。

当北京的报刊掀起报道陕西城镇青年赴大巴山开发山区的热潮时，身为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耀邦却言真意切地发表了一通“不同意见”……

耀邦热爱青年人，也了解青年人，他喜欢和他们谈心交朋友，也知道应该如何关心和爱护青年人，又如何鼓励和引导他们前进。青年人身上的拼搏精神和朝气，青春激情和锐气，无私无畏的决心和勇气，正义感和同情心，他看得很重，无比珍惜，生怕挫伤青年人身上这些特征、特点。政治上，他是青年人的导师；思想上，他是青年人的挚友；行动上，他是青年人的楷模，他对青年人有很深的情，很深的爱。

有件事一直让我难忘。一九六四年北京的报刊掀起一场报道陕西汉中城镇青年奔赴大巴山黎坪垦殖场开发山区的热潮。当时我正在河南出差，接到社里的电报，要我赶赴西安，与已派出的几位记者一起赴黎坪山去采访，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一本报告文学集。当时耀邦是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决定先去看望耀邦，同时还可以听听他的意见。晚上，我们来到耀邦的住处。“耀邦开了一天的会，很累，交谈的时间不要太长，你们从黎坪采访回来，还可以再来。”耀邦的秘书戴云和李传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摄影家杜修贤摄于胡室客厅

华叮嘱我们。

走进耀邦的办公室，他正在躺椅上休息，一脸倦色，显得十分疲惫。他口气温和地问我们：“你们做什么来了？”没想到我们说明来意后，他腾的一下从躺椅上起来，一改刚才的温和的口气，激动地说：“我就不赞成让这些城镇青年到黎坪去锻炼！陕西有山有路有水有地，资源丰富，又适宜农、林、牧、副业发展的地方很多，这些地方农业生产需要提高，农业科学需要发展，农业技术需要改造，都很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为什么不叫他们到这些地方去锻炼，去发挥作用，单单选中了黎坪！？黎坪海拔一千六百米，崇山峻岭，灌木丛生，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既没有公路，又没有可耕地，吃的、用的全都要从外边往里边运，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劳动锻炼，把荒山野岭建设成农业的新天地就那么容易吗！？国家能投入的财力、物力是很有限的，靠家庭、靠亲友、靠父母的支援，能持久地坚持下去吗！？”讲到这里，他的口气又缓和了下来，“我的这些看法也许不对，供你们参考，你们还是可以到黎坪去看看。好了，今天不谈这个了，你们还想到什么地方走走……”

听了耀邦的话，我感到震惊和意外，当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讲这番话的深刻含义，只觉得他与报刊唱的不是一个调子。几天后，我们离开西安市，乘火车来到汉中市，从汉中市到黎坪就没有车坐了。我们四个人整整在大山里走了两天，才来到大巴山中的黎坪垦殖场。我们和青年一起放牧、一起开荒、一起赶集、一起做饭。这里只有荒山野谷，没有耕地，在灌木丛生的山坡上披荆斩棘，一镢头一镢头地刨开荒山坡，把种子撒下去。每天带着星星出工，太阳落山收工，有时整整一天还不能从山下刨到山顶。中午饭随身携带，大都是在半山腰上吃的，从山上往下看，山坡陡得让人眼晕，这种原始的播种法，能长出多少粮食！？如果下场大雨，来场山洪，不是什么都完了吗！吃的、用的，全都要靠人爬山越岭往山里背。几天生活下来，我深深地感到耀邦说出了我现在心里想的，眼里看到的一切，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科学态度，坦率耿直的作风，非凡的胆识和勇气，让我由衷的钦佩和感动。

耀邦亲自修改点校了采访劳模吕玉兰的报告文学。他说：朴实的文字是最有力量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根据耀邦的指示，我们几个人采访了吕玉兰，写了一篇五万字的报告文学，准备出版一本题为《吕玉兰》的小册子。清样排出后，我给耀邦送去一份，请他审阅。几天后，我因别的事到耀邦家去时，顺便问起是否看了这份清样。耀邦随手从茶几上拿起，告诉我他已经看过了。我把清样翻了一下，惊喜地发现，凡用字不当，用词不妥，评价不准确的地方，以及多余的叙述和描写，耀邦都用铅笔划了出来，有的地方还做了改动。当时，我很激动，也很高兴，发自内心地说了一句：“耀邦同志；谢谢您了。”耀邦靠在沙发上，缓缓地说：“吕玉兰年纪那么小就参加生产劳动，当生产队长，伙伴们拥护她，社员们支持她，她能团结人，能带头吃苦，事迹本身就很感动人，只要如实地把事实写出来，就很生动。朴实的文字是最有力量的，不要过分追求词藻的华丽，形容词多了，议论的东西多了，描写过分了，反而让人怀疑事情的真实性。”耀邦改过的清样，我一直好好地保存在手边，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但他讲的这些话，却深深地记在我的心中，让我在以后的编辑工作中，一直牢记他的教导。

耀邦有许多作家朋友，他关心他们的生活、身体，更关心他们的作品和写作

我知道耀邦与著名的老作家柳青有很深的友谊。每年五月，柳青都要到北京躲避关中小麦扬花时给他带来的严重的过敏性哮喘病。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每年来京期间，柳青几乎都要到富强胡同去看望耀邦。柳青重情，耀邦坦诚，两人在一起交谈时，无比舒心和畅快。有一年柳青与耀邦约好会面的时间，但耀邦病了，住院前还专门拜托胡克实代表他款待柳青。一九七七年五月，柳青看过耀邦的当天晚上，我去柳青的住处，柳青显得格外的兴奋和激动。他告诉我，今天与耀邦畅谈了一个下午，很鼓舞人，耀邦决心一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而奋斗，再不能发生

“文化大革命”这样荒谬的历史，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理想，他的气魄、他的胆识、他追求的目标，让我非常钦佩！当时柳青的女儿可风还笑着告诉我，耀邦送柳青出门时，问他：“你怎么来的？”柳青说：“坐车来的。”耀邦又问：“车呢？”柳青指了指立在墙根的自行车，原来是女儿用自行车把他推来的。耀邦显得很激动，立即叫司机把自己的车开出来，让柳青上车，还要可风把自行车也放在车上，他站在门口，一直望着汽车远去。一九七八年柳青在京病逝后，当时耀邦的工作已经非常忙了，但他表示一定要参加柳青的追悼会。

陕西的作家，对耀邦都怀有深厚的感情，都愿意和他谈心。一九五九年的夏天，应中青社之邀，著名作家杜鹏程到北戴河团中央疗养所休息，刚好耀邦也在，两个人交谈了多半天，耀邦还拿出茅台酒招待杜鹏程。这次佳会传到陕西后，作家们都很受鼓舞。

耀邦有许多作家朋友，他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身体，但他更关心的是他们的作品和写作，他深知写作中的艰难和甘苦。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第三卷出版以后，广大读者和关心这部小说写作的人，都询问四、五两卷何时出版，急迫地等待着阅读，催促姚老快点写出来。一次，在新侨饭店的聚会上，耀邦见到了姚雪垠，热情地握着姚老的手，问寒问暖，问他的身体和写作，当他了解到姚老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开始构思写作《李自成》时，他激动了，他说：“要保重身体，按你自己的计划进行。我虽然也很急，等着看《李自成》的下两部，但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受外界的影响，不要急，不要赶，从容写作，质量第一。”

张扬和《第二次握手》的平反，历经艰险，每次都是在关键时刻，得到耀邦的有力支持，才使他转危为安

一九七八年《中国青年报》编印的“青运情况”上刊出了由姚文元一手制造的冤案，把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打成“反动小说”，把作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张扬打成“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许多团员和青年因传播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受到株连处分，直到“四人帮”倒台后两年多，